



一个医生对疫情的失德言论

■ 本报评论员：余凡

最近，一名叫罗依丝(简称LO)的女医生在社交媒体发表缺乏科学证据、医药理论、关于新冠疫情的谈话，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争议。她说新冠疫情是编造的，疫苗是药厂用来捞钱的骗局，而病亡者是因药物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对政府的抗疫工作起到了不良影响。

罗依丝作为研究“抗衰老”(anti aging)的营养专业医生，表示将继续维持她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理论，以及其幕后隐藏的企图。她扬言已致信给国安会(DKN)及国家情报局(BIN)，还有将官协助联系卫生部。“我联系过的多数人都明白疫情的现状，但难于向其他方面说清楚。”她甚至认为Cov-

id-19并非病毒，认为新冠肺炎不是致死的重症。

《罗盘网》(KOMPAS.com)于11日称，在社交网络论坛节目，霍特曼(Hotman Paris)问她那些以防疫规制埋葬的亡者是否死于新冠病毒？罗依丝答道：“是药物的相互作用导致的，若公开医院的资料，所配的药品超过6种。”这番言论随即在民间引发不安，医协(IDD)领导普科维沙(Pukovisa Prawiroharjo)医生声明已发出公文邀罗依丝周二进行约谈。医协也肯定罗依丝不是其会员，因她的登记手续(STR)早于2017年已逾期失效。

《共和网》(REPUBLIKA.CO)于11日报道，医师道德协会(MKEK)已对罗依丝发函约谈，但她对记者说：“只是传召，我将拒绝，因为我的学识很珍

贵。”“在现实生活中我已尽力为卫生部(Kemendes)及医协助力，但因他们因搬搬世卫组织(WHO)的协议而拒绝了。”

关于药物的相互作用，UGM大学的药剂大师茹利丝(Zullies Ikawati)教授说明：“那的确有可能。何况，人患上一种病时，通常需要服用几种药。”不过，不是所有相互作用会危及病人，“药物的相互作用有时会互补的好处，所以不可以广义而简单地归纳，必须经过独立的调查研究。”还要有协同性的协助调查，以及经过反面、逆向的验证。

《呼声网》(Suara.com)也对相关言论表示质疑。因为当被问及为何数千人到医院求治，罗依丝答道：“有的因为免疫力的下降，另一类可能是生活压力(Stress)。”这番没有

数据支持的神来之笔，也引发了另一论争。因事态不断扩大，雅加达警察厅迅速采取行动，以免谣言四起，被阴谋集团用来抹黑、攻讦政府的抗疫工作。

《独立网》(Merdeka.com)于12日报道，警方已经对罗依丝进行刑事拘留，警察总部(Polri)公关处长尤沃诺(Argo Yuwono)督察宣布：“周日时首都警察厅(Polda Metro)控制，随即交警察总部处理。”警方没有透露抓捕过程以及关于案情的其他细节。

《讲坛网》(TRIBUN-NEWS.COM)报道，根据警方公关主任拉玛丹(Ahmad Ramadhan)警官透露，罗依丝可能被控违反1984年第4号关于传染病瘟疫的宪法。警方还不能说明其他可能对罗依

丝提告的法律条款。当天，罗依丝还在“被调查”的阶段，警方需在24小时内找到有力的证据，以平息民间的各类猜测。而罗依丝的“支持者”也在蓄势声援。

自由政论员卢迪(RudiS-Kamri)在论坛视频中痛斥罗依丝医生的无知失德、器张愚蠢，甚至引述罗依丝就读印尼基督教(UKI)大学时同窗的话说，她在读书时就有精神问题的倾向。卢迪也谈到罗依丝不负责任的嘴炮，已被反政府阵营用作攻击总统的炮弹。她自认为天才的卓越远见，不过是缺乏科学认知的空洞理论。罗依丝狂妄卖弄与军方高层的交情和关系，已被证明是凭空吹嘘的泡沫。卢迪对警方迅速、坚决地扣押、刑申行动表示支持。

表示支持警方的还有医生协会(IDI)，其发言人认为罗依丝可能被警方以散布谎言、制造恐慌提出刑法控告。不过，有评论认为，医协不须从法律角度评论罗依丝的言行，而应该以医学、医药专业知识和验证数据驳斥那些不实的言论，更能让民众心服口服；而关于牵涉到法院、疫苗、谎报疫情等有关法律的事，就全权交由警方及司法部门处理好了。

网上有不少支持罗依丝的贴文：“感到不安的是获利集团。”“药厂加深贫富间的问题。”“雨露均沾，所以多数医生保持沉默。”“警方更应该调查那些拒收‘医疗保险’(BPJS)的医院。”当局看来已是成竹在胸，不会让一个医生的言论，掀起无谓的风波。

■ 雅加达：王平

新冠病毒疫情自2020年初爆发至今已过去了约一年半，世界上的国家对于疫情的政策，能实行“赶尽杀绝”净化模式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极少数小国。其它国家只能实行“和平共存”新常态的生活模式。也只有中国的经济能力以及群众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方面能做到实行严密封城或封区，以防止冠毒蔓延以及就地消灭。

中国是个具有面积非常广阔，实行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疫情以来经常得到从境外带进来的病毒，有时从外国入口食物或物件发现病毒，最近还有外国物件寄来可疑的飞虫。似乎中国实行冠毒净化政策也是没有其它选择的，而且能够做得到。因此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无外乎是共产国家的“铁拳”镇压逼迫人民服从一切措施而得到的效果，事情是那么简单吗？让我们看看一个小护士写下的疫情爆发初期亲身经历非常感人的遭遇，从这里可想象到当时中国医护人员和一般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状况，是不是被政府用暴力镇压的国家会展示这种景象？

一个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边远小城市的一间医院工作，还没有正式编制的小护士，唯一被派往武汉抗疫参加(省级)自治区医疗队的人，她原来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没有想过要出名，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正式的编内人员。2020年正月初一得到上级的“军令”到武汉抗疫，跟父母告别时只说要去自治区参加培训，走出家门抱定誓死报国的决心，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到达武汉后被分配到

对于冠毒应该“赶尽杀绝”还是“和平共存”？

荆门市，五十多个日夜超负荷工作一天十小时。十小时里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疲惫非常。面对一个个感染者，一个死去的病人，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死者身体擦拭、换上衣服、装进尸体袋、行三鞠躬、上消毒车到火葬场火化，都是一把手。

三月十七日武汉疫情被战胜了，小护士第一批撤离湖北。欢送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坐大巴往机场的一路上看到居民楼上的人们，开窗挥动着国旗大声喊着：谢谢！谢谢你！她和队员们都被湖北人感动的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到了武汉天河机场，登上了返程的包机起飞了，她回顾五十个日夜，被授予“荆门市荣誉市民”，享受在荆门终生旅游和宾馆免费的待遇，名字也被记载并存放在博物馆等等的回忆。回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自治区的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有警车开路，警察敬礼敬献鲜花、献哈达，还有群众夹道欢迎，她和队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鄂尔多斯豪华宾馆隔离十四天，和其他十四人坐飞机回到呼伦贝尔，隆重的欢迎仪式后一个人坐专车回到了离别两个多月的小城，迎接的仪式使她感动不已，警察开道，还有警察列队敬礼。和市长、医院领导和同事们一一握手，还有欢迎的横幅、鲜花、照相仪式欢迎她一个人的归来，感动！流泪！无法形容！短短两个月成了小城市的英雄，真像做梦一样。

以上短短的故事阐述医者敢于牺牲生命的精神以及被救群众的感恩心情，还有小城市群众把拯救别人的人当成英雄，反映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社会景象以及群众的情怀，同时回答了为什么这个国家能以严密封城的模式和实行对于冠毒“赶尽杀绝”的措施获得成功。

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与冠毒和平共存”的模式获得抗疫的全面胜利。就是说在冠毒存在的环境下，人们跟以往一样安逸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人因为冠毒病倒或死亡。

“与冠毒和平共存”的原则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对于冠毒的抵抗力，虽然到处可能有看不见的病毒，但是奈何不了人们。所以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是每个人都接受了疫苗的接种。

美国最近几个月集中全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全国大多数人接种了疫苗，新冠疫情很快就会过去。为什么疫情似乎这么容易解决，就这么简单吗？印尼跟其它发展中国家能效仿美、欧式的“与冠毒和平共存”的实践方法吗？实际上疫情的结局在于人体抵抗力的问题，在世界上存在其它如感冒、乙型肝炎等病毒，但不是每个人都容易被感染上的，因为他们体内有对于这类病毒的抵抗力。从人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经验得知，凡是感染过天然病毒而幸存的人永远不会再被感染上，所以接种弱化的或死的病毒疫苗是人类对病毒症的答案。现代欧美国家已经研究不出由病毒制造的生物科技冠毒-19疫苗，跟普通疫苗比起来有其优、缺点。可以说如

果没有政治上或黑商的干扰，新冠疫情问题本来不难解决。印尼跟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受到国内外方面的干扰，把事情复杂化，使一些人能够浑水摸鱼，易于贪污或有意使国家经济崩溃，有利于某些人或集团得到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

印尼总统佐科维2020年初时曾经提倡过我们将要和新冠病毒“和平共存”，后来很多反派的舆论批判这个字眼，从此社会上没有人再提及。实际上“和平共存”这个字眼是很现实的，因为即使有一天到了新冠肺炎这个病症不流行的太平时节，并不证明病毒已经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谁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周围没有肉眼看不到的冠毒生存着，这可谓和平共存。试看接近新冠疫情结局的几个国家现在都用上这个字眼了。

所以“和平共存”是一种象征，形容在病毒存在的社会环境里人人能够安然无恙的工作学习生活，并不是跟进到人体里面的病毒“讲和”并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相反的一旦病毒偶然进到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体里的时候即刻被体内的淋巴细胞以及免疫抗体消灭，因为这些经过与人类胜败搏斗一年半后传染给人的第10代新冠病毒是比较弱的，而人们对于提高对付病毒抵抗力的健康生活模式已经得到了教育和改良，可望将来的结局是这种乐观的局面。

现在由印度入境的DELTA型冠毒造成了“社会上”的恐怖，传染速度快了“老”冠毒快上几倍，但是凶悍度已经没有刚在印度爆发时那么厉害。接

种过疫苗的人偶尔感染伤风、咳嗽、发热，应该在心理上当作普通感冒，即使有感冒病毒或者新冠病毒入侵，让身体里的免疫抗体去对付、搏斗、消灭吧！而患者仅需要克服不舒服感觉的症状，可用PARACETAMOL等副作用很低的药剂，每三、四个小时服一次，同时等待5至7天抗体把病毒消灭，症状自然消失。“莲花清瘟胶囊”、“清肺排毒汤”等的作用一样，用于克服病毒感染时出现的不适症状。但是中药的缺点是阴阳要对症，比方“莲花清瘟胶囊”是属于清凉(属阴)的药，对于手脚寒冷、尿频乏力属虚寒症的患者可能不适合且无效，能找到性平或微温的药才对症。

现今印尼社会上最不利的形势是人们过分的恐慌造成神经质，曾经接种过疫苗的人一旦出现咳嗽、鼻塞、发热等症还是十分恐惧，然后去做鼻腔核酸检测，当测到阳性时非常焦急，非得进医院入病房，口口声声跟人说打了预防针还会感染冠毒。实际上接种过疫苗的人的身上、脸上、鼻孔里随时会有飘来的冠毒是很正常的，等一会也将遭遇

严阵以待的免疫抗体把它们打击或消灭，而在搏斗之时难免会出现以上的症状。

对于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冠毒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输入康复病人的血浆。其次是实行“少而精”的饮食方法，就是注意动物蛋白的份量比较大，以及糖或蜂蜜的摄取，作为免疫球蛋白以及免疫细胞的原料，而且每餐吃喝不可至饱而造成负担。实际上至今没有特效的药剂能克服冠毒，份量太强的药剂反而搞垮体质甚至破坏免疫抗体，有些老人反而得了中风、心肌梗死甚至导致死亡。

那么在财力、人力、物力可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实行“赶尽杀绝”的模式战胜新冠疫情比起“和平共存”是不是更为理想？从主观的角度来看似乎消灭病毒净化环境的模式是很理想，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和平共存”所达到的效果也不差，而且节省了庞大的金融开支，如果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尼实行“赶尽杀绝”模式的话，可能倾国荡产了疫情还肆意猖獗。

(作者系中医师。本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杨菲菲 (Fifi Young)

尽管对影片中东方主义倾向的详细研究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们认为这些本质主义表现形式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表明华人电影制作人是如何努力在银幕上将风格迥异的荷属东印度形象演绎出来的。无可否认，将印尼群岛的林林总总搬到银幕上肯定需要一个剪辑和提炼的过程。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可以假设电影中荷属东印度形象的东方化，是努力将荷属东印度放到以电影为媒介的文化交流范畴中的做法。王爱华(Aihwa Ong)在

华人电影作品中的“印度尼西亚” (4)

■ 夏洛·史迪亚地 (Charlotte Setijadi Dunn) ■ 汤姆斯·巴克 (Thomas Barker)

2006年撰写的文章中认为，战略性地自我东方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以看作是殖民地人民在西方霸权中表现自己并重新获得权力的明智之举(hal.135)。她认为，通过对独特的荷属东印度形象的印尼化，尽管这种形象具有本质主义性质，华族电影制片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实体，为荷属东印度电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领域。威廉·范·德·海德(William Van Der Heide)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1937年的电影作品《月圆》(Terang Boelan)代表了对“印度尼西亚化”过程的趋势整合，也标志着印尼电影的新方向(2002:128)

基于上述说明，我们可以假设早期电影中故事情节和场景进行印度尼西亚化的趋势是印尼电影后续发展的关键阶段。

当时，也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开始在银幕上塑造印尼人的面孔。讽刺的是，20世纪

30和40年代荷属东印度的著名演员多数都是华人。杨菲菲(Ferry Kok)和陈清木(Tan Tjeng Bok)等都是荷属东印度电影界的名人。而杨菲菲，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例子。这位出生在亚齐的华族年轻女子(原名陈金娘 Tan Kim Nio)在多数电影中都是荷属东印度女性之美的化身。在《马打兰之剑》中，她身穿爪哇格峇雅(Kebaya)，在《朱拜达》(Zoebaida)中穿着帝汶风格的传统服装，而在后来的电影中则扮演了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的现代印尼女性。与当时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她身上散发出来一种国际魅力，令她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所向披靡。

通过各种电影场景、演员的选择和马来语的使用，可以说华族电影制片人将本土和全球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对印尼文化的视觉演绎。虽然他们使用的表现形式和技术还远远不能称之为完美，但

无可否认的是这种演绎正是观众对银幕上所描绘的印尼人的第一印象。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电影中采用“拼凑”策略或零散抽取一些本土文化元素的做法，极有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么做可以增进电影与底层土著观众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观众希望他们的文化元素能够出现在电影当中。当然，也有可能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有关，这种需求要求对本土和全球文化元素交融其中的印尼文化进行描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电影是表现本土文化的首批本土电影，所以没有先例参考如何在电影中表现荷属东印度文化。鉴于一些华人制片人如王氏兄弟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应该能够根据广为人知的当地文化群体本质主义形象来构建他们所观察到的荷属东印度本土文化，所以这种猜测也极有可能。

撇开上述情形，华族电影制作人作为荷属东印度电影制作的先驱者，在塑造科恩(Cohen)于2006年所提及的“独特的荷属东印度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单一的超级文化和独特的形象融入了20世纪40年代的原始民族主义运动中。

梁友兰(Nio Joe Lan)是一位华族电影历史学家。1941年，他声称早期本土电影让荷属东印度居民第一次意识到荷属东印度的故事和自然风光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1941:18)。电影中对本土故事的描述，唤醒了当地人民的归属感和自我反思，特别是后来日益高涨的独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需要提醒的是，当时本土文化元素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说明了华族电影人制作的本地电影也受到国外人士的青睐。20世纪30年代，荷属东印度电影已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今马来西

亚)等马六甲海峡地区，甚至中国，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具有与好莱坞电影相媲美的高品质，《月圆》等荷属东印度电影在一些地区受到了热烈追捧。在这件事上，梁氏认为荷属东印度电影在国外的放映展示了努山达拉群岛的独特之美，从而形成了国际社会对荷属东印度及其人民的看法(1941:18)。根据梁氏的说法，上述全球观点的心理效应就是在当时荷属东印度居民中引发了自豪感，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统一印尼的一份子。

由于华族电影人在综合本土元素和大都市全球元素方面的创造力，荷属东印度人民不仅在电影中看到他们自己，而且感受到他们正在参与到比本土和西方现代性更为广阔的领域中。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国际大都市视野令华族电影人深陷险地，他们被视为种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这种意识形态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新兴的印尼国家蓬勃发展。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